学术前沿·清代中国的对外形象、认知与交往

清朝对哈萨克诸部认知中的“知识断裂”

——以“北哈萨克”概念为中心

郭文忠

[摘要] “北哈萨克”从满文公文中最初指代中玉兹，到《西域图志》中指代小玉兹即西部哈萨克，逐渐发展到《海国图志》中指代“左、右、西”三部之外的另一政治单元，何秋涛等人虽回到《西域图志》所指，但也脱离了乾隆时此词对小玉兹的指代意义。其间，甚至出现嘉庆《大清一统志》指称右部的严重错误和《朔方备乘》中的全新地图标注，但都没能辨明来龙去脉。在跨越不同群体、语言环境的过程中，“北哈萨克”指称陷入混乱，这导致满文档案、官私汉文著述出现“知识断裂”的现象。考察清朝对哈萨克认知的变化规律，能够更好地揭示清朝边疆观的变迁及其长远影响。

[关键词] 北哈萨克　知识断裂　满文档案　官私著述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3）－05－0063－010

清朝官方是否能够与时俱进地准确掌握哈萨克诸部知识，并运用于边疆治理实践中，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对于同时期的俄罗斯，有中国学者认为，清朝对俄罗斯的认识，可分为了解俄国“知识”的热潮、乾隆朝以后对俄知识的固化、最终落伍于时代三个阶段。① 国外学者也以魏希德对宋代文人知识体系与信息秩序的研究作为参照，② 提出清朝对边疆知识的总结可分三个阶段：1750 年前为开始阶段，1750 年至 1800 年为发展阶段，1800 年至清末为转型阶段。③ 以上研究注意到乾隆时期清朝边疆知识建构的“空前绝后”态势，但仍留有较多研究空间。从更

[收稿日期] 2023-02-07
[作者简介] 郭文忠（1978—　），男，新疆大学历史学院、历代西北边疆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乌鲁木齐 830046；gwzwesley@126.com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乾嘉时期中国与中亚诸部关系变迁史料整理与研究”（18BZS070）、新疆高校科研计划项目（XJEDU2021S1004）阶段性成果。

① 孔源：《从尼布楚条约到〈朔方备乘〉——康熙至咸丰年间清朝关于俄国知识的形成和固化》，《俄罗斯研究》2021 年第 2 期。该文注意到以《朔方备乘》为代表的清朝著述在对俄罗斯的认知中存在固化，落伍于时代。

② Hilde De Weerdt, “Byways in the Imperial Chinese Information Order: The Dissemination and Commercial Publication of State Documents,” HJAS 66:1 (2006): 145–149.

③ Matthew W.Mosca, “Empire and the Circulation of Frontier Intelligence: Qing Conception of Ottomans,” *Ha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ume 70, Number 1, June 2010, pp.147-207；Matthew W.Mosca, “The Literati Rewriting of China in the Qianlong-Jiaqing Transition,” *Late Imperial China*, Volume 32, Number 2, December 2011, pp.89-132。笔者认为，该研究使用“帝国”定义清朝是不准确的，对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属性的认识不足也是其缺点之一，但这两篇文章通过对多种文献的比较，提出了颇有价值的问题。

加系统、完整的满文档案出发，厘清乾隆时期及之后诸多档案文献、史学著述和地图中的概念混乱，对此梳理、辨析，探讨各时期清朝官员和文人阶层对哈萨克知识掌握的准确程度，有助于此一领域研究的深入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对哈萨克诸部中的三大部落集团，学界一般认为，清朝称其为“左、右、西”三部，并将之对应于哈萨克语自称的“三玉兹”和卫拉特蒙古语中的“三准”。考察汉文记载中不同称呼与分类所出现的先后顺序，可知乾隆朝《西域图志》和该时期的上谕、奏折大多使用“左、右”二部的概念，[①] 嘉庆朝《钦定新疆识略》正式将“左、右、西”三部并列，[②] 道光朝魏源《海国图志》中出现“左、右、西、北”四部说，[③] 光绪朝《新疆图志》沿用三部说且兼顾二部说，[④]《清史稿》将各版本记载拼合、堆砌成新三部说。可见二部说和三部说影响最为深远。以上所列乾、嘉、道、光及民国 5 个时段的代表性著述，其记载既体现出前后承继的关系，也体现每时段编著者力图超越前时段作者认识的努力。

但对照乾嘉两朝满汉文档案所记载的史实，就会发现清后期官私著述中对哈萨克诸部之表达，逐渐变得混乱，距离历史真实也越来越远。从清朝对哈萨克诸部认知的形成上说，汉文表述多译自满文公文，而且清代各朝满、汉、哈、蒙文语境中的哈萨克诸部，所指范围皆有变动，反映出不同语境间对应关系并不严格且具有深层机理。体现为清朝君臣对哈萨克的认知改变与知识获取间存在互动关系，其变化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乾嘉时期清朝边疆治理观念的转变，在边疆政策富有活力的时段，对哈萨克知识的获取更为及时，对其认知也更为准确；在边疆政策陷入僵化后，对哈萨克知识的获取也随之滞后，对其认识也更为模糊。以下考察清朝对哈萨克认知中“北哈萨克”概念的产生、流传和变迁，以期揭示其间的演进路径。

有学者注意到在《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乾隆十三排图》中，在相邻的位置出现汉文的“北哈萨克”和所对应的满文音译“阿玛尔吉哈萨克”两个地名，认为此可能与哈萨克使者亨吉噶尔和卓兰提供给军机处官员的信息直接有关，[⑤] 但未能辨明该地名为何标注在此处。《乾隆十三排图》中，在“七排西四”分图中，“北哈萨克”和“阿玛尔吉哈萨克”地名，分别标注在今巴尔喀什湖正南偏西四五度地方，与标注在“七排西三”分图中靠近阿雅古斯河清朝边界的中玉兹“阿布赖哈萨克”区分开，[⑥] 该地名的史源应为包含满文“amargi hasak”（北哈萨克）的文本。考察以往研究的分析，西哈萨克使者在京接受军机处问询时，确实涉及“北哈萨克”。而从档案内容来看，军机处官员在询问卓兰前就已经知道“北哈萨克汗巴巴”，他们将军机处上年询问阿布赉使者亨吉噶尔而绘制的地图出示给卓兰，询问是否有误，卓兰称皆对，虽图上有他未曾去过的“伊希尔”等地名，想来亦无误；军机处官员接着向卓兰询问，其所称“西哈萨克有二汗”，除阿比里斯汗外，还有名“汗巴巴”之汗，此名与奈曼部之“汗巴巴”是否一人：“再我等从前闻得，在北哈萨克之汗巴巴，为管理奈曼部之台吉”，奈曼部汗巴巴是否具有宰桑官职？卓兰答称：西哈萨克名“汗巴巴”之汗，因外出参加葬礼而未能与清朝使者相见；而奈曼

---

① 钟兴麟等校注：《西域图志校注》，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95、560−572 页。

② 松筠：《钦定新疆识略》卷 12“哈萨克”条，《中国边疆史地丛书（初编）》第 1 辑，台联国风出版社，1969 年。

③ 魏源：《海国图志》卷 31、32，国家图书馆藏本。

④ “哈萨克有左、右、西三部，左部为汉坚昆地，右中部、右西部则汉康居地也。”这里将三部说里的“右、西二部”置于右部下，并称“右中部、右西部”，是解决嘉庆朝“三部说”与乾隆朝“左、右”二部说冲突的一种尝试。参见王树枏等纂，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图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 387−388 页。

⑤ 巴哈提·依加汉：《从地图和纪行史料看清朝对哈萨克的早期认识》，《民族研究》2018 年第 2 期。

⑥ “阿布赖”为“阿布赉”的不同音译名。

部汗巴巴因有台吉血统，所以他具有掌管奈曼部宰桑事务之权，实为苏尔坦，但并不拥有宰桑官职。[①]

从这段问话来看，卓兰对以“台吉”“宰桑”等词所代表的准噶尔蒙古政治秩序较为熟悉，且他认可亨吉噶尔对地名方位的表述，两位使者都认为“北哈萨克”指代的是奈曼部汗巴巴所属的部落集团。由此引出的问题是，这一汗巴巴所属的“北哈萨克”部落集团是否指中玉兹，或是指介于汗巴巴自身部落和中玉兹之间的某一部落联盟层级？而根据兆惠奏折可知，奈曼部汗巴巴游牧地在中玉兹的偏北位置，[②]与《乾隆十三排图》中“北哈萨克”被标注的巴尔喀什湖西南位置相距遥远，并不对应。因而，前人研究认为，这一地名来自两位使者陈述的推论存在疑点。为什么会对应不上？《乾隆十三排图》中的“北哈萨克”到底有何含义？笔者认为，“北哈萨克”概念是清朝方面的独特认识，可据较常见的三类文献记载来考察该词从史源到应用间的异同。

二、对满文档案的考察

第一类文献是满文档案。满文档案中“amargi hasak”（北哈萨克）所指代的对象，可总结为4种。

第一种是左部哈萨克，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策楞在奏折中称，“古尔班和卓……其一阿勒巴图逃出，现在北哈萨克游牧”；[③]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富德奏折内的劝降话语称，“此数年来，灭准噶尔，降服北哈萨克，安定西哈萨克、塔什干回子”，[④]其中“降服”一事，特指阿布赉经交战后归附清朝。因而这两处“北哈萨克”，明显都指代阿布赉所在的中玉兹，也即左部哈萨克。此说明“北哈萨克”集中出现于前线将领与官员的满文奏折中，指代地理方位上处于北方的阿布赉所属的左部哈萨克，与相对处于南方的右部哈萨克进行了区分。

第二种特指左部奈曼部汗巴巴台吉，如上述乾隆二十二年军机处官员与亨吉噶尔谈话里出现的“amargi hasak i hambaba”（北哈萨克之汗巴巴）。

第三种特指左部阿布赉，如乾隆二十三年六月的满文上谕，将“北哈萨克”与阿布赉连用（amargi hasak abulai）：“西哈萨克特柳克等所属地方，尚未如北哈萨克阿布赉归附我等。”[⑤]亦有满文上谕表达中虽省略左部和阿布赉，但所言之使者俄罗斯苏勒坦为阿布赉派出，说明其指代的是阿布赉所属左部哈萨克，如“再新近派往北哈萨克之章京那旺等，带领哈萨克前来朝觐之俄罗斯苏尔统”。[⑥]这类情况中的“北哈萨克”特指阿布赉所代表的左部哈萨克，经由前期的自

① 《军机处奏查哈萨克汗世袭源流片》，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本文所引档案均藏该馆），档案号：03-0177-1726-044。

② 《定边右副将军兆惠奏将来归之杜尔伯特台吉伯什阿噶什所属罗卜藏等审明并送往其游牧等折》，乾隆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76-1611-012。

③ 《定西将军策楞奏将阿逆所属宰桑那木布正法折》，乾隆二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76-1608-021.2。满文转写：gūrban hojo……ini emu albatu tucifi ne amargi hasak i nukte de bi。

④ 《定边右副将军富德奏侍卫额勒登额由瓦罕前往巴达克山索要霍集占折》，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初十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78-1787-027。满文转写：ere udu aniya jun gar be mukiyebume, amargi hasak be wame dahabuha, wargi hasak, tasihan i hoise be tohorombume。

⑤ 《军机处为著传谕兆惠等尽力擒拿哈萨克锡喇等贼事寄信定边将军等》，乾隆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满文上谕档》，档案号：03-18-009-000021-0003-0074。满文转写：wargi ergi hasak telioke sei harangga ba, umai amargi hasak abulai adali musede dahaha ba akū。

⑥ 《军机大臣为接到传谕布鲁特车哩克齐之谕旨著即转交并将伊之回奏由军台速递事寄信驻巴里坤办事布政使》，乾隆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满文上谕档》，档案号：03-18-009-000025-0001。满文转写：jai jakan amargi hasak de takūraha janggin nawang se hasak i hargašame jihe oros soltong sebe gaifi jidere。

下而上奏报，此用法已被内廷采用并进入上谕中，因而出现自上而下的使用情况。

第四种是小玉兹额尔类。乾隆二十三年三月至六月，额尔类受阿布赉邀约，至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参与追击准噶尔残部的行动，额尔类进入清朝的视野。七月上谕中称“惟额尔类乃别部之人”，[①] 八月上谕中称“哈萨克额尔类所属阿尔沁部”，[②] 富德九月奏折内称询问由哈萨克脱出厄鲁特人拜吉胡得知“额尔类乃奇齐玉斯鄂托克哈萨克，彼等游牧与阿布赉后（北）方边界相连，居于土尔扈特游牧附近，由此处行走需二三月”。[③] 乾隆君臣在《乾隆十三排图》绘制前，清楚额尔类来自奇齐玉斯即小玉兹的阿尔沁部。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身处前线的富德专折奏报中亚诸部间的游牧界址，[④] 此奏折中出现“西哈萨克、塔什干北（后）方哈萨克额尔类，阿布赉等（wargi hasak, tasihan, amargi hasak erlei, abulai se）”表述，[⑤] 这与乾隆二十四年定稿的《乾隆十三排图》应具有直接相关性。奏折中，富德将“西哈萨克”“塔什干”“北（后）方哈萨克额尔类”“阿布赉”并列，以阿布赉一人代表左部哈萨克，因而表达的是三大哈萨克部落集团。此说明在这一时间节点上的清朝前线官员看来，“北（后）哈萨克”指代额尔类所属的小玉兹。

从以上所列乾隆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的满文奏折、上谕中所提到的 4 种指代对象，可以认为，在满文语境史源里，“北哈萨克”是与处于南方的右部哈萨克进行区分而出现的，实际指代的是位于右部哈萨克北方的阿布赉、汗巴巴台吉所在的左部，并以此进入上谕文本。而富德专折中的“北（后）哈萨克”却指向了额尔类所属的小玉兹，并极可能被《乾隆十三排图》所采用。

满文档案中的哈萨克游牧历史地理信息，与呈现在《乾隆十三排图》上的三处哈萨克地名相比，前者内容更加丰富，而后者仅能体现某一时间段的内容，且在呈现时还经过了一次信息加工，增加了新的理解和判断。档案和地图的形成中，又都存在大量相关活动漏缺记载的情况，这就需要从以下历史事件、满文档案、地理位置三方面加以考察、合理分析，才有可能复原历史地理原貌。

从历史事件来考察，《乾隆十三排图》上的三个“哈萨克”地名是不同时间形成的，“阿布赖哈萨克”标注的阿雅古斯河以西的位置，虽离载入《西域图志》的阿布赉游牧地叶什勒（isil）较远，[⑥] 但反映了乾隆二十二年阿布赉归附时的实际所处位置，即位于靠近清哈边界的哈萨克界内。“北哈萨克”指阿布赉和奈曼部汗巴巴所在的左部也即中玉兹，亨吉噶尔使团朝觐时，军机处把阿布赉所在部落称为北哈萨克，[⑦] 代表的是中玉兹，而其后左部说法的产生应和史书撰写或清廷的再定义有关。“阿玛尔吉哈萨克”指额尔类所部，额尔类率小玉兹兵前来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又与清朝将领接触献马并放行清朝运送粮草队伍，且可能藏匿叛清的哈萨克

① 《军机大臣为著接奉此旨速即领兵前往策应富德事寄信定边右副将军》，乾隆二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满文上谕档》，档案号：03-18-009-000022-0001-0084。满文转写：damu erlei encu aiman i niyalma。

② 《军机大臣为著派人赴哈萨克额尔类处索取哈萨克锡喇而后径赴阿克苏拿捕小和卓木事寄信定边右副将军》，乾隆二十三年八月十四日，《满文上谕档》，档案号：03-18-009-000022-0002-0055。满文转写：hasak erlei i harangga elcin aiman。

③ 《富德奏》，乾隆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满文朱批奏折》，档案号：04-02-001-000604-0068。满文转写：erlei serengge, kiciyus otok i hasak, ceni nukte abulai i amargi jecen i adame, turgvt i nukte de hanci tehebi, ubaci juwe ilan biya yabumbi。按：该件无题名，且未收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

④ 《参赞大臣富德查奏报特穆尔图诺尔一带地形地貌物产以便确定布鲁特游牧边界折》，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77-1728-022。

⑤ 该段满文又可断句理解为额尔类、阿布赉都属于北哈萨克即中玉兹，但难以成立，一是将同一部落内非汗的额尔类列名于清朝已认可为汗的阿布赉前于理不符，二是清朝认可他的别部头目身份，并无称额尔类属于北哈萨克的先例。

⑥ 钟兴麟等校注：《西域图志校注》，2002 年，第 95 页。

⑦ 《军机处奏查哈萨克汗世袭源流片》，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77-1726-044。

锡喇，[①] 其贡马被绘入《哈萨克八骏图》，[②] 说明清朝对其部落有较深印象。“北哈萨克”“阿玛尔吉哈萨克”这两个相关地名，反映了乾隆二十三年下半年清朝对哈萨克左部整体和额尔类所在部落的认识。

当时上下行公文使用满文，且“北”在乾隆朝满文中并无与“哈萨克”连用的先例，应是通过前线将领奏折中使用的满文而进入清朝公文系统的，继而被地图绘制者所采用。《乾隆十三排图》上，“阿玛尔吉哈萨克”和“北哈萨克”邻近，都译自“amargi hasak”，有可能是军机处官员为在地图中尽量完整地保存信息，用满汉双语记载中玉兹或小玉兹。但在舆图上书写满汉对照地名并不符合常理，两处地名意义应不同。

“北哈萨克”地名应指阿布赉所在的左部即中玉兹，来自满文“amargi hasak”。因为直至乾隆二十四年，“北哈萨克”和中玉兹在公文中都高度对应。满文 amargi 有“北方”之意，翻译成汉文的“北”搭配在“哈萨克”前，从表示方位的笼统指向成为中玉兹这一具体部落集团的名称，轻微改变了意义。富德十一月专折中的“wargi amargi hasak burut”表述，[③] 亦应理解为“西方、北方的哈萨克、布鲁特”，而不应译为“左右哈萨克、东西布鲁特”。

“阿玛尔吉哈萨克”地名应指小玉兹，来自富德奉命专门确定游牧界址的十一月专折中的“amargi hasak erlei”（后方哈萨克额尔类），是富德九月奏折中阿布赉后方“abulai i amargi jecen i adame”（与阿布赉后方边界相连）这一用法的满文缩写。

乾隆二十三年九月，乾隆君臣就已清楚额尔类属于奇齐玉斯阿尔沁部，游牧地在土尔扈特旁，与哈萨克左右部有别。因小玉兹位于中玉兹西面，清朝和准部都位于中玉兹东面，从东面看去小玉兹确实在中玉兹后方；而满文 amargi 有“北”和“后”二意，“后方”之意能和小玉兹位置对应上。因而《乾隆十三排图》上“阿玛尔吉哈萨克”的满文原文“amargi hasak”可能来自“后方哈萨克”之意的卫拉特语。之所以不汉译为“后哈萨克”，应是因为不易理解。又因中玉兹同为“amargi”（北），《乾隆十三排图》绘制时为了区分两个“amargi”（北、后），用“北哈萨克”和“阿玛尔吉哈萨克”分别命名。这一处理方式被画入了地图，而没有去和满文奏折、上谕中的“左右”部用法发生关联。

从地理位置来考察，钦天监和军机处的官员不仅共同参与绘制《乾隆十三排图》，而且还共同参与编制《时宪书》、绘制和编订《西域图志》地图，因而内府舆图和历书中的经纬度标注应具有一致性。[④]《乾隆十三排图》中，“北哈萨克”“阿玛尔吉哈萨克”被分别标注在“古沁古尔班托罗辉”以北和西北方向上，“古沁古尔班托罗辉”意为“33 条托罗辉河”，[⑤] 这一名称能够与图中位于其下方的有多条河流汇入的湖泊相对应，可以该河、湖的位置来作为判断“北哈萨克”所指的参照物。再考察《西域图志·左右哈萨克部图》，可以看到有和《乾隆十三排图》相对应的河、湖，其形态为多条河流注入一个未标名称的湖泊；在此湖泊北方有标“依底克鄂拉”的地方；由此再向东，则分别标注“右哈萨克界”“左哈萨克界”。由此可知，“阿玛尔吉哈萨克”“北哈萨克”的位置应在“依底克鄂拉”附近。姑置不论《西域图志》上的哈萨克左、右部交界位置是否准确，也可以据此推测《乾隆十三排图》上的“北哈萨克”，应位于哈萨克左、右部游牧交界之邻近处。《乾隆十三排图》中，对于“北哈萨克”标注在左、右部哈萨克交界位

---

① 《富德奏》，乾隆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满文朱批奏折》，档案号：04-02-001-000604-0068。

② 郭文忠：《从满文档案和美术史资料看清朝与哈萨克诸部关系史——以〈哈萨克贡马图〉源流为中心》，《美术研究》2018 年第 3 期。

③ 《参赞大臣富德查奏报特穆尔图诺尔一带地形地貌物产以便确定布鲁特游牧边界折》，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77-1728-022。

④ 郭美兰：《乾隆年间西北地区三次绘图始末》，《满语研究》2013 年第 1 期。

⑤ 位于今哈萨克斯坦中北部图尔盖高地和中南部的夏勒哈尔湖地区，参见巴哈提·依加汉：《从地图和纪行史料看清朝对哈萨克的早期认识》，《民族研究》2018 年第 2 期。

置，而未在左部哈萨克中心位置的原因，笔者认为此含义应为“自此即为北哈萨克界”；同理，“阿布赖哈萨克”也标注在靠近清朝边界的哈萨克界内，而非离清朝边界月余行程的阿布赉实际游牧地。总之，清廷在《乾隆十三排图》中对“阿玛尔吉哈萨克”“北哈萨克”“阿布赖游牧”地名的标注，皆应源自清廷内府地图绘制时所持的观念，即“自此地始即为某界”。[①] 也就是说，三个地名都标注在边界地区，以指代某部落集团的范围，表示从东方进入阿布赉游牧势力范围和从南方进入左部哈萨克和小玉兹，这与今日将某区域的地名标注在该区域的中心位置的地图观不同。

《乾隆十三排图》绘制中，军机处统领下关键人物和群体间的互动，对“北哈萨克”概念的形成亦有影响。受命前往天山北路绘制分图的钦天监官员何国宗等人，带领何国宗随军行走且曾出使哈萨克的侍卫努三，亲身带兵至哈萨克、布鲁特等地的富德，以及从左部使者亨吉噶尔、右部使者卓兰等口中获取信息的军机处大臣等人之间，应有大量信息沟通。地图上“北哈萨克”地名及方位，应是由熟悉边情的前线官员告知何国宗等人的，西域地图绘成初稿后，经军机处讨论、修正、汉译而载入《乾隆十三排图》。何国宗等人虽未能亲至哈萨克游牧，但能通过与努三等人直接交谈、吸收富德等前线将领实地访查的地理信息，加以军机大臣经过询问两批使者对地图稿本的校误，吸收富德等人访查界址专折内容，将“北哈萨克”“阿玛尔吉哈萨克”“阿布赖哈萨克”三处地名标注在《乾隆十三排图》上。此三处地名尽管存在指代不够清晰的缺陷，但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总之，清朝公文中的 amargi hasak 最早专指北方的哈萨克，军机处询问的“北哈萨克汗巴巴台吉”、满文档案中出现的“北哈萨克阿布赉”“北哈萨克使者”，都指阿布赉所在的中玉兹。根据军机处对卓兰问询记录，不足以得出汗巴巴台吉来自中玉兹之外另一个部落联盟的结论。《乾隆十三排图》中的“北哈萨克”地名应指自此进入中玉兹地界。阿玛尔吉哈萨克，来自对阿布赉所在中玉兹后方小玉兹的称呼，被吸纳进了《乾隆十三排图》，应指自此进入小玉兹地界。需指出的是，“北哈萨克”这个从地理方位产生的词，在其后的清代官方地图中不再出现，造成该词脱离语境被使用的现象，为其后官私文献中的概念混淆埋下了伏笔。

三、对汉文官私著述的考察

乾隆四十七年编定的《西域图志》，因其在官方修撰的西域著述中的核心地位，成为其后诸多官私著述中征引哈萨克表述的史源。其中，对“北哈萨克”的记载出现重大变化，造成了广泛影响。该书卷 44“右哈萨克”条，在描述右部哈萨克四周地名时，出现“东与左部接……北至依底克鄂拉，名北哈萨克，西南为格根郭勒”之表述；同时《西域图志 · 左右哈萨克图》中，虽未出现“北哈萨克”地名，但将“依底克鄂拉”标注在左、右部哈萨克交界处西面的右部北方界外。考虑到“鄂拉”在满文中意为“山”，该书称“依底克鄂拉”在右部哈萨克最北处，便可认为是右部哈萨克与“北哈萨克”的自然边界；这里的“名北哈萨克”应与《乾隆十三排图》中的用法一致，指自此进入北哈萨克界，方位大致能对应上小玉兹。《西域图志》编撰者认为，“北哈萨克”是左、右部哈萨克之外的又一哈萨克政治单元，但由于“阿玛尔吉哈萨克”的省

① 笔者就此问题请教王元崇博士，他指出，考察清代钦天监所制《时宪书》中朝鲜等清朝藩属国之坐标时，发现皆不在国都位置，而在靠近边界地区之位置。这一观察与本文对《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乾隆十三排图》中哈萨克两处地名标注的考察相符合。虽然存在钦天监官员因未能身临清朝界外藩属国而标记错误之可能，但鉴于清朝已拥有自明末就传入的西方全球地图，此中含有清朝各藩属国首领驻扎地的相对准确位置，藩属国中心位置和边界位置相距较远不应弄混，标记在靠近边界位置，应是有意为之。参见王元崇：《清代时宪书与中国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2018 年第 5 期。

略，使得“北哈萨克”从指代中玉兹变成了小玉兹，这导致关于哈萨克的知识更加混乱。笔者认为，《西域图志》编撰者在表面上延续了《乾隆十三排图》对“北哈萨克”的认识，将其单列于左右部之外，却又未加辨析，而满文奏折、上谕中的“北哈萨克”所主要指代左部哈萨克的认识，已经被彻底遗忘，而且与之一起被遗忘的还有富德奏折中用“amargi hasak”（后哈萨克）指代额尔类所属的小玉兹的认识。《西域图志》初稿编成时间与《乾隆十三排图》接近，撰修官员应具有相近地理认识，变化之处在于不再核对满文史源，开始形成新的汉文知识体系。

嘉庆二十五年（1820）编定的《大清一统志》中“右哈萨克”条下，[①] 出现“其部曰乌拉克玉兹，其俗大略与左部等，又名北哈萨克”之表述，并有小字标注引自《西域图志》。“乌拉克玉兹”为大玉兹，即右部哈萨克，该书试图说明右部习俗和左部相似，但节外生枝地称其为“北哈萨克”。从这段话来看，撰修者仅在汉文语境中分析，既未核对富德所上的系列满文奏折，也未核对《乾隆十三排图》《西域图志·左右哈萨克图》中的左右部之方位，只简单地引用《西域图志》文字，且还删去了关键信息——右部哈萨克“北至依底克鄂拉”，导致错误理解“名北哈萨克”一句，混淆了“北哈萨克”与右部哈萨克。嘉庆《大清一统志》的编撰者望文生义，疏忽考证，完全错误地理解了《西域图志》之原意，将“北哈萨克”当成“右哈萨克”的别称。此说明哈萨克部归附60余年后，部分官方史书编撰者因对哈萨克认识模糊而开始出现严重的错误。相较而言，乾隆四十九年（1784）编定的《大清一统志》中“右哈萨克”之表述为“其俗大略与左部同，西北一带尚有城郭部落”，[②] 亦注引自《西域图志》，但未出现错误认识。嘉庆《大清一统志》中的错误，反映出清廷已失去有效辨析“北哈萨克”信息的能力。

《西域图志》中的“北至依底克鄂拉，名北哈萨克”说法，是造成其后诸多参考该书的汉文著述弄混“北哈萨克”概念的源头。《西域图志》中，这一说法若单独出现，可如《乾隆十三排图》那样指额尔类所在的小玉兹；但在《西域图志》分述左、右部哈萨克的体例约束下，“北哈萨克”说法出现在右部哈萨克条内，却又未明说是“奇齐玉斯”，使其地位处于未知状态。对于《西域图志》中过于简略而又容易引起歧义的表达，在图、文、奏折皆可利用的乾隆中期，参考者尚有可能在上述语境中理解与考证原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官方著述者逐渐失去重新核对原始满文奏折等一手史料的条件，对于哈萨克的表达也就日趋混乱，导致清廷内部出现不同哈萨克知识体系并存的现象。这些相互矛盾的信息流传下来后，形成以讹传讹的知识脉络，进而影响到各类官私著述。

第三类文献是汉文私家著述。汉文私家著述中，七十一于乾隆四十年著的《西域闻见录》较有代表性，内称：“哈萨克两种，其一为阿布赖比及其弟阿布尔必斯、阿布尔班必，并各台吉所属，与伊犁、塔尔巴哈台连界，臣服中国……其北界之哈萨克又是一种，未通中国，人户尤强盛云。”[③] 从该著的部分独特表述来看，《西域闻见录》中的有关哈萨克知识，既受官方著述的影响，也有著者自己的理解。该书将哈萨克分为两部：一为阿布赉等众首领所在的部落集团；二为“北界之哈萨克”。“北界之哈萨克”势力强大且未通使，因而不可能是听从阿布赉号令的中玉兹的汗巴巴台吉部；[④] 位于阿布赉部北方，又不可能是偏南方的大玉兹即右部哈萨克；而位于最西北的小玉兹即“奇齐玉斯”，确实在此书编成前与清朝通使一次，不广为人知。因此，该

①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529“右哈萨克”条，《四部丛刊》续编，上海商务印书馆再版影印本，1932年。该部被公认为是《大清一统志》中质量最好的一部，参见牛润珍、张慧：《〈大清一统志〉纂修考述》，《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但从本处来看，其西部边疆内容的准确性相较乾隆《大清一统志》出现倒退。

② 和珅等：《钦定大清一统志》，《钦定四库全书》本，卷420“右哈萨克”条。

③ 七十一：《西域闻见录》卷3“外藩列传”，国家图书馆藏乾隆四十二年刊本。七十一对哈萨克的分类中忽视右部，应与其关注点在北疆，以及乾隆后期右部与清朝联络减少有关；含北哈萨克内容，应因其与左部接壤且人户较多有关。

④ 《军机处满文月折档》，乾隆二十年十一月和十二月，胶片号：53。

书中的“北界之哈萨克”最有可能指哈萨克三玉兹体系内的小玉兹，但因七十一未将“北界之哈萨克”与小玉兹对应，使得读者会认为“北哈萨克”是三玉兹以外的一个部落单位。笔者认为，其中原因很可能是七十一闻得“北哈萨克”说法后，考虑到阿布赉等人所在的部落集团通常被称为“左部哈萨克”，且又无“北哈萨克”即小玉兹的确证可引，从而他据自己的见闻和理解将“北界之哈萨克”描述成一个新的部落集团，这一理解和分类对后世著述也造成了较大影响。

道光朝魏源编撰《海国图志》时，在之前形成的哈萨克“左、右、西”三部说的基础上，正式增加“北哈萨克”。[①] 魏源将关于哈萨克四部的讨论放在该书的《西域闻见录》条目下，可见其史源之一为七十一提及的“北界之哈萨克”。他说：“哈萨克有四大部，左哈萨克其东部，右哈萨克、塔什干其中部，布哈尔其西部也，此三部外尚有北哈萨克，近鄂罗斯，不通中国，疑即此所谓阿喇克者欤？左右二部为古康居，西北二部为古大夏。”此处不就魏源对哈萨克其他三部认识中存在的诸多错误展开，仅就“北哈萨克”而言，其“不通中国”的表述应是采纳了《西域闻见录》的观点，所补充的“近俄罗斯”等信息，应是在七十一认识基础上的一种推测。

应该注意到魏源的“四大部”说，是在乾嘉时期西北史地学兴起的背景下出现的。[②] 彼时学人之间多有互动交流，学术影响广泛，但因这些学者大都未能利用到乾隆朝满文档案等核心史料，因此都不具备准确揭示乾隆朝时期相关事件和概念的条件。在不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以推测而形成的著述，进一步脱离了历史语境，导致哈萨克知识出现错误。魏源参照《西域闻见录》，将“北哈萨克”概念纳入自身新创的“四大部”知识体系的著述方式，也影响到姚莹、徐继畬等人的著作。姚莹称，“哈萨克有四大部，左哈萨克其东部，右哈萨克、塔什干其中部，布哈尔其西部也，此三部外尚有北哈萨克，逼近鄂罗斯，不通中国”；[③] 徐继畬称，“哈萨克……右二部之北，别有部曰北哈萨克，以寇抄为俗，时侵掠峨罗斯边境，峨设兵防之”。[④] 姚莹之著基本照搬魏源；徐继畬的则对右二部有自己的理解，他对乾隆时期将哈萨克大、小玉兹称为右二部的习惯理解正确，但因望文生义，将《西域闻见录》里本应对应于小玉兹的“北哈萨克”理解成另一部哈萨克。

魏源将不属于哈萨克的布哈尔当作哈萨克西部，而将独立于哈萨克三部外的一部落认定成“北哈萨克”，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乾隆朝，七十一的听闻可能不够准确，但他并没有妄下定语，留下了“北界之哈萨克”指代小玉兹的余地。道光朝，以魏源为代表的学人群体缺乏查核满文档案的条件，虽然能够根据之前汉文文献中出现的这四部哈萨克指称进行推测，但缺乏严谨考证，坠入牵强拼接之中。他们认定的“北哈萨克”虽应指小玉兹，但这一结论是建立在将布哈尔部认作哈萨克西部，以及割裂乾隆朝形成的“西部”概念与小玉兹关系的错误认识基础上的，这一认识既未与哈萨克自称的小玉兹对应，也没有和乾隆朝已有的知识连接。这一由“北哈萨克”概念反映出的魏源对哈萨克诸部的错误认识，被徐继畬、姚莹等人吸收，进而造成知识断裂。另外，还需指出的是，魏源在《圣武记》和姚莹在《康辅纪行·西边外蕃诸国图说》中，都忽略“北哈萨克”，采用了嘉庆朝“左、右、西”三部说，这也体现出他们对哈萨克认识的混乱之处。

鸦片战争以后，汉文私家著述中也集中出现“北哈萨克”。较有代表性的是咸丰十年

---

① 魏源：《海国图志》卷 31，国家图书馆藏本。

② 参见侯德仁：《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群言出版社，2006 年；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年。

③ 姚莹撰：《康辅纪行》卷 15，同治刻本。

④ 徐继畬：《瀛寰志略》卷 3“西域各回部”条，道光三十年福建抚署刻本。

（1860）获御赐书名的何秋涛《朔方备乘》，该著称："右部……北至依底克山，接北哈萨克部界，北哈萨克者以寇抄为俗，时侵掠俄罗斯边境，俄罗斯设兵防之"，"至北哈萨克一部，距中国最远……其部当俄罗斯东、俄南、俄之中路，通莫斯科洼仅三千里程，实为俄罗斯腹心大患，故长宿重兵以防之"；此外，该著还在按语中称，"伊犁之北曰哈萨克，回部之大者也。左、右二部皆于乾隆中归附，膺世爵，纳贡税维谨。其右部之北，别有部曰北哈萨克，以寇抄为俗，西、北二境皆与俄罗斯为邻"。① 从西、北两面与俄罗斯接壤来说，显然应是小玉兹，但他未借鉴《钦定新疆识略》称小玉兹为西部哈萨克的说法，也未使用乾隆朝时音译自哈萨克语并进入满汉文献的"奇齐玉斯"来指称小玉兹，这说明他也未能跳出之前已形成的官私汉文文献中的"北哈萨克"概念知识体系，没有认识到他所表述的"北哈萨克"与小玉兹的关系，而将"北哈萨克"当作又一哈萨克政治单元。

此外，何秋涛还将这一认识贯穿在了《朔方备乘·图说》中，他在《中国与俄罗斯交界图》《地球东半图》《明北徼地图》《俄罗斯初起时地图》《康熙年间俄罗斯图》《乾隆初年俄罗斯图》《乾隆末年俄罗斯图》《嘉庆年间俄罗斯图》《道光末年俄罗斯图》9幅地图中标注"北哈萨克"，这事实上是进一步传播了错误的知识。何秋涛所绘前汉、后汉、三国、晋、元魏、隋、唐、五代、辽、金、元共11幅《北徼地图》，皆无"哈萨克"地名，但已绘有和明清时期相似的地域轮廓；他据《坤舆图》所绘反映嘉靖年间局势的《明俄罗斯分十六道图》，有"哈萨克"而无"北哈萨克"；而所绘《明北徼地图》兼有"哈萨克""北哈萨克"。可见，何秋涛认为明后期"北哈萨克"就已存在，但又未在图说中加以阐释。其间的不解之处，说明他因乾隆朝"近古"知识的断层，在"以近古推远古"绘制历史地图时，缺乏统合辨明的能力。② 何秋涛准确理解了《西域图志》之意，增绘地图时能参照《乾隆十三排图》，③ 除用"北哈萨克"指代小玉兹，替代乾隆朝"西部哈萨克"的用法以外，在文字表达上没有受到魏源等学者错误认识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光绪十二年（1886）李文田著《元秘史注》，为古今对照，加入了包括"北哈萨克"在内的诸多西域地名。该书表述："伊犁之北曰哈萨克，其右部之北曰北哈萨克，北哈萨克西北约四百里即乌拉岭。"④ 这里的"其右部之北曰北哈萨克"清晰阐释了《西域图志》中的表述，将"北哈萨克"明确为右部北方的一个哈萨克政治单元，没有犯《大清一统志》中的错误，但也未采用载于档案和"御制诗"中的"奇齐玉斯"即小玉兹的对应满汉音译说法。因《西域图志》等影响广泛的官书称左部和右部之外的哈萨克政治单元为"北哈萨克"，因而在一部分清朝士人认识中，有先入为主的现象，他们在延续正统叙述的同时，回避深入考证，错过了纠正前书错误的机会。从《元秘史注》中提及的"乌拉岭"来看，应是受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的影响，何秋涛在《朔方备乘》据乌拉岭来讨论"北哈萨克"的位置，并绘有地图9幅。《元秘史注》中的这段话本身也存在指代不清之处，此为本就错误之认识又增添了一层模糊信息。

四、结语

"北哈萨克"是乾隆时期前线清军最早使用的满文词，"左部哈萨克"则是京城君臣主流说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后者逐渐在历史书写中取得了绝对的优势地位。但前线场景中"北哈萨克"才是主要用语，大多指阿布赉率领的哈萨克中玉兹，只有个别界址调查的奏折则用此指称额

①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6"哈萨克内属述略"，光绪刻本。

②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68"图说"，光绪刻本。

③ "正与内府图所绘托穆伊聂谢地形相合"，见何秋涛：《朔方备乘》卷68"道光末年俄罗斯图说"，光绪刻本。

④ 李文田：《元秘史注》卷13，光绪二十二年渐西村舍刻本。

尔类所属的小玉兹,《乾隆十三排图》中的“阿玛尔吉哈萨克”即采纳了后一说法，标识的是大玉兹即右部与小玉兹即西部这两大哈萨克部落集团的分界位置。尽管清廷从乾隆二十年开始就在对前线行文中使用“左部哈萨克”，但前线的“北哈萨克”用法一致延续至乾隆二十四年，其中的原因应为满文中“amargi”（北、后）比“dergi”（左、东）更符合实际地理方位。随着清军在这一地区的活动逐渐减少，“北哈萨克”的用法从上下行公文中迅速消失，而清廷在各种官方著述中使用的“左部哈萨克”日趋成为主流说法。自满文公文系统中的“北哈萨克”被“左部哈萨克”所取代后，这一概念通过汉译进入官私著述中，直至清末。

References

Bakhyt Ezhenkhan−uli. “Cong ditu he jixing shiliao kan Qingchao dui Hasake de zaoqi renshi” (Viewing the Qing Dynasty’s Realization of Kazakh from Maps and Travelogues). *Ethno-National Studies* (2) 2018.

Kong Yuan. “Cong Nibuchu tiaoyu do Shuo fang bei cheng: Kangxi zhi Xianfeng nianjian Qingchao guanyu Eguo zhishi de guhua” (From Treaty of Nerchinsk to *Shuo fang bei cheng*: forming and outdated its own knowledge about Russia by Qing Dynasty in Kangxi to Xianfeng era). *Russian Studies* (2) 2021.

Mosca Matthew W. “Empire and the Circulation of Frontier Intelligence: Qing Conception of Ottomans”. *Ha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ume 70, Number 1, June 2010.

The “Knowledge Fracture” in the Qing Dynasty’s Cognition of Kazak Tribes: Centered around the Concept of “North Kazak”

GUO Wenzhong (School of History, Xinjiang University;gwzwesley@126.com)

Abstract: “North Kazak” first referred to Middle jüz in Manchu official documents, then to Junior jüz which is Western Kazak in the *Xi Yu Tu Zhi*, and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another political unit outside the three parts of “Left, Right, and West” in the *Hai Guo Tu Zhi*. Although He Qiutao and others returned to the reference in *Xi Yu Tu Zhi*, they also separated from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to Junior jüz in the Qianlong era. During this period, there were even serious errors in Jiaqing’s *Yi Tong Zhi* referring to the right part, as well as brand new map annotations in *Shuo Fang Bei Cheng*, but they were unable to distinguish the origin and background. In the process of crossing different groups and language environments, the reference to “North Kazak” fall into confusion, which has led to “knowledge fracture” in Manchu archives, official and private writings regarding the reference to “North Kazak”. Examining the changing patterns of the Qing Dynasty’s understanding of Kazak, can better reveal the changes of the Qing Dynasty’s border perspective and it’s long−term impacts.

Keywords: North Kazak, knowledge fracture, Manchu archives, official and private writings